

努力打造边疆民族地区现代化人民城市的“云南样板”

明庆忠 刘宏芳

在202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作出重要部署，其核心要义与201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的“人民城市为人民”重要理念一脉相承，深刻回答了城市建设为了谁、依靠谁以及建设什么样城市、怎样建设城市等根本问题。当前，随着“3815”战略发展目标及系列重大举措的推进，云南城镇化进程显著加快，全省进入城乡一体统筹发展的关键阶段。城市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抓好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云南正处于重大发展机遇期，如何深入创建现代化人民城市，塑造边疆民族地区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样板，成为一个亟待深入思考并着力推进的重大课题。

深入理解现代化人民城市的深刻内涵

解决云南城镇化水平不高的关键抓手，城市作为区域发展的中心，通常具备更多的就业机会、更高的收入水平以及更优质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资源，是广大劳动者和创业者实现梦想的重要平台。然而，由于云南整体经济发展仍处于上升阶段，城镇化水平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仍有差距，表现为基础设施不完善、城市特色与历史文化彰显不足；受地形地貌和生态条件制约，土地利用效率不高；城市治理理念相对滞后，存在“重建设轻管理、重经济轻社会”的倾向，公共服务意识有待加强等。此外，老旧小区改造滞后、交通拥堵、社会治理压力增大、公共空间不足等问题也制约着云南城市高质量发展，亟需在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中系统谋划、重点突破。

体现云南各族人民的殷切希望。更好地满足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的重要价值取向，也是衡量城市幸福指数与发展质量的关键标准。当

前，云南正致力于打造“旅居云南”品牌，这既是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的核心要求，也是践行“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构建幸福样板的实践路径。上海提出的“五个人民”——人人都有出彩的机会、人人能有序参与治理、人人能享有品质生活、人人都能切实感受温度、人人都能拥有归属认同，为云南提供了重要参考。这一理念有助于增强市民对城市发展的认同感、参与感和归属感，推动形成对现代化人民城市重要理念的广泛共识、情感共鸣与行动共融，是实现城市与人民共生共荣的重要价值导向。

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的重要途径

把握好现代化人民城市的人本价值。要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把人民价值作为推动城市发展的重要遵循，聚焦解决“老、小、旧、远”等问题，充实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打造公共空间、绿色空间，打造充满活力的机遇之城。城市的核心是人，关键是12个字：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安居乐业，包括居民收入、生活成本、公共服务、通勤效率、城市更新和老旧小区改造、营商环境建设、青年创新创业就业、生态宜居、智慧韧性安全城市建设等具体内容，涵盖涉及广大市民和市场主体切身利益的方方面面，更好体现以人为本，千方百计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牵肠挂肚的民生问题。

以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统筹新型城镇化建设，“旅居云南”品牌打造。以人民为中心的城市建设是中国“以人为本”传统思想与城镇化发展的高度融合，有力彰显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的人本性，其立足点是体现人民性特征，共绘风景线、画好起跑线、筑好保障线，呈现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的系统性思维，坚持以“生活品质之城”为引领，提高城市发展的速度与质量，将在推进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旅居云南”品牌打造等统一于推进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的目标之下，在边疆民族地区形成“标杆”“样板”。

做好顶层设计，建立完善考核机制。为统筹新型城镇化建设，“旅居云南”品牌

打造等，建议组建领导小组，完善其组织架构和工作规则，制定出台主体文件、实施方案、年度计划等一揽子制度安排。

做好宣传，突出“人民城市人民建”的理念。为人民谋幸福、让生活更美好作为城市工作的鲜明主题，阐述城市发展理念如何从经济保护发展到“五位一体”，强调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为目标的云南人民城市建设，并加以宣传、贯彻落实，用现代化人民城市的理念，结合数字云南、开放云南、创新云南的发展，将城市建设“以人为本”的理念与云南城镇化发展高度融合，呈现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的系统性思维，以文化软实力提升城市品格、以历史沉淀打造城市新名片、以空间营造增强城市互动、以地方特色建筑改造探索可阅读性，提升人民的生活满意度，促进人人参与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的全过程，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格局，加快构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云南样板。

因此，云南应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重要论述，坚持以人本价值为导向，牢牢把握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的战略使命。要以做优做强城市核心功能为主攻方向，着眼未来谋划功能布局，立足基础夯实功能支撑，在对标一流、追求卓越中提升城市发展的能级和软实力，努力打造边疆民族地区现代化人民城市的示范样板。

（作者为云南财经大学教授，云南财经大学首席教授、旅游文化产业研究院院长，云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兴滇青年英才，云南财经大学旅游文化产业研究院副教授。来源《云南日报》）

数字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空间转向

张利国

空间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场域，是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基础和依托，深刻影响着共同体成员的文化心理和精神特质。空间作为一种分析工具，为社会科学的研究带来了新的视角与方法。

20世纪60年代，西方理论界针对当时理论研究过分注重时间与历史考察而忽视“空间”的研究，提出了“空间转向”的议题，并逐渐成为诸多学科研究的热点。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元宇宙等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数字技术重塑了人类空间样态，数字与空间的深度耦合使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场域出现了向数字空间发展的现实转向。数字空间成为影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与实践的重要变量。

数字时代“铸牢”的空间转向呈现新样态。数字空间打破了传统的地理界限和相对固定与封闭的存在状态，开辟了各民族真实生活外的虚拟空间。数字技术推动数字公民的诞生，数字空间成为大众实践公民身份的另一个场域。一方面，数字化活动使公民突破了物理空间的场域束缚，跨越了阶层差异、地位高低、身份属性等现实壁垒，在动态开放的数字空间平等地享有更多主体权利，参与公共事务管理和实现共有身份认同。另一方面，数字时代，跨区域流动成为常态，也引发了数字鸿沟扩大、文化冲突加剧等诸多挑战。数字时代，有关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话语主体和内容形式发生了显著变化，多样化数字空间的涌现极大拓展了信息传播渠道，各族群众可借助数字社交平台自由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传播注入了更多独特性与个体性的元素。

面对数字技术重塑社会空间的深刻变革，需以系统观念构建虚实共生、内外联动的数字空间结构，从理论转化、情感凝聚、治理优化、交往联结等维度，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新路径。

一是加强数字空间研究与开发，赋能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实践。发挥政府、高校、科研院所协同优势，通过有组织科研、跨学科团队、跨平台数据整合，重点加强数字空间的社会属性、关系结构及动态交互特征研究，以及算法逻辑、平台规则对各族群众网络互动模式的内在影响研究等，为精准开展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与实践研究提供科学依据。加强数字孪生技术、虚拟现实技术等运用，加快数字应用平台开发。通过构建铸牢

的数字镜像，开发线上博物馆、数字档案馆，搭建民族地区数字服务平台等，发挥数字空间在丰富和拓展共同体建设新路径方面的积极作用。

二是强化历史与文化的深层认同，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数字空间的情感基础。要发挥数字空间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叙事建构、集体记忆激活以及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的强化作用，夯实各民族情感认同基础。发挥数字空间跨时空的优势，通过教育叙事连接历史文化中的精神内核，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善用算法技术，优化算法价值接入和数字空间的情感基础，优先推送具有思想深度、价值内涵和历史文化厚度的议题，引导各族群众接触正能量、高质量信息，打破信息茧房，培养各族群众理性情感表达能力，构建兼具历史厚度、文化深度与情感温度的数字空间。

三是坚持铸牢与协同共治，优化数字空间治理。加强数字空间多元治理主体联动，激发多元协同治理优势，加强正向数字信息的传输引导。积极发挥社交平台舆论引导作用，营造良好的数字空间氛围。加强对数字平台、用户以及利益相关者的监管与治理，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行业规范，共同维护数字空间的良好秩序。

四是重构共享与信任的联结纽带，密切数字交往空间。要充分发挥主流媒体在文化、信息、政策、制度等方面优势，通过优化叙事内容、升级传播手段、加强价值引导、聚合资源力量等，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主流价值体系的整合性功能。注重促进各民族的文化交流与融合，以增进共同性为方向，尊重和包容文化差异。通过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文化活动，增进各民族的了解和互动，促进情感和心灵的深层认同。此外，强化各族群众媒介素养培育，提升数字交往能力，增强各族群众的认同感与归属感。

当下，数字时代空间转向问题已成为“铸牢”理论与实践的时代新命题。要主动加强数字空间的研究与转化，为数字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新路径选择。

【作者系中国民族学学会副会长、大连民族大学教授。本文系2025年度辽宁省经济社会发展研究课题“人工智能赋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研究”（项目编号：2025lshybwzkt-057）阶段性成果。来源《中国民族报》】

以数字赋能谱写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新篇章

熊良林

2025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云南考察时强调：“要保护好利用好木府这样的文化地标，保护好传承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引导各族群众自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这为保护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2025年8月，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强调：“推动人工智能在繁荣文化生产、增强文化传播、促进文化交流中展现更大作为，利用人工智能辅助创作更多具有中华文化元素和标识的文化内容，壮大文化产业。”当前，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交往方式。因此，积极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数字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以超级IP为叙事，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叙事的精神图谱。超级IP矩阵的构建本质上是文化资源的积累与转化过程。在保持文化基因纯正性的同时，赋予其现代表达形式。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核心价值导向，通过深度挖掘中华文化基因库中的符号资源与精神密码，运用守正创新的方法论，构建具有文化向心力与价值传播力的超级IP矩阵体系，该矩阵包含历史根源系列IP、中华文化系列IP、新时代探索创新系列IP等，用“小而美”的叙事模式，将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鲜活故事和真实案例，改编为电影、电视剧、微视频等多元艺术形式，用有温度、有力量的作品，展现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在当下的生动实践。如云南开放大学依托平台，探索“故事采集—内容生产—多平台分发—价值转化—社会影响”的融媒体路径。近年来，学校深度挖掘了王陆芬、谢成芬等优秀学员在乡村振兴、民族团结领域的先进事迹，借助学校官方微信公众号、开放教育教学平台、张桂梅思政大讲堂云南开放大学分课堂、云南乡村振兴学习网、全国高校思政网等平台进行传播宣传，积极探索构建“榜样引领、融媒聚力”的IP传播矩阵。

以智能算法为导航，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价值的精准滴灌。在数字时代，应用好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加强舆论引导。一是依托用户画像与协同过滤算法，在满足差异化信息需求的基础上，

民族民间音乐艺术在中小学音乐教学中的作用与实践

潘海涛

音乐教育作为美育的核心组成部分，其使命在于陶冶情操、塑造健全人格，并引导学生理解与尊重人类文化的多样性。中国民族民间音乐艺术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哲学思想和情感表达方式，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文化启蒙的生动教材。将其系统地融入基础教育阶段，对于建立青少年文化自信，培养具有深厚家国情怀的下一代具有重要意义。

民族民间音乐艺术在中小学音乐教学中的作用

一、增强文化自信与民族认同感

在全球化日益加深的今天，青少年接触的音乐类型五花八门，他们对最新的流行歌曲如指掌，却对自己家乡的民歌、身边的戏曲感到陌生。将民族民间音乐系统地融入中小学音乐教育正是对抗这种文化疏离感、培育文化自信与民族认同的有效途径。学生在课堂上聆听蒙古族长调悠远辽阔的旋律时，老师可以讲述草原人民与自然相依的生活哲学，模拟骏马奔跑的节奏和模仿呼啸风声的唱腔，引发学生对草原景象的联想；在学习江南丝竹时，《中阮六板》的细腻婉转能瞬间将学生的想象带入小桥流水、烟雨朦胧的江南水乡，感受脚下这片土地孕育出的丰富多彩、意境深远的音乐。从而在心中萌发出最初的文化自豪感。民族民间音乐的学习还能够帮助学生建立起一条清晰的文化传承脉络，组织学生探讨家乡的本土音乐，采访身边的老人，学唱一首方言童谣，这些活动能让他们亲手触摸到“活”的历史，强化他们的主人翁意识，意识到自己有责任去了解、传播这份独特的民族音乐

财富，从而增强了文化自信。

二、提升学生音乐素养与综合能力

民族民间音乐为拓宽学生的音乐视野提供了教材，中国民族民间音乐在旋律上常常运用“腔音”，即一个音高上有细微的波动和装饰，这种细腻的处理方式能有效训练学生听觉的敏感度。在节奏方面，新疆维吾尔族木卡姆复杂多变的节奏、黄土高原上安塞腰鼓铿锵有力的律动打破了常规的、均衡的节拍模式，极大地丰富了学生的节奏感知。此外，民族民间音乐的表演形式往往强调集体性，这为培养学生团队协作能力提供了天然的平台。以共同编排一场小型的民族民间音乐演出为例，这个任务需要学生们分工合作：在排练民歌歌唱或民间器乐合奏时，学生们必须学会倾听彼此的声部，理解自己在整体中的角色，相互配合以达到节奏、音色和情感上的统一。学生之间不断磨合，最终完成项目演出，其收获的不仅是一次表演经历，更是深刻的团队精神与集体荣誉感。

民族民间音乐艺术在中小学音乐教学中的实践策略

融合，沉浸式AR技术呈现民族音乐场景。沉浸式AR技术能够将虚拟信息叠加到真实世界中创造出一种亦真亦幻的交互体验，从而把学生“带入”音乐诞生的原生土壤。具体的实践做法可以从以下几个环节展开：一是音乐教师要与信息技术老师或专业机构合作，针对特定的教学主题开发相应的AR内容资源库。如以“陕北信天游”为主题创建一个AR场景，学生用AR眼镜扫描教室墙壁上悬挂的一幅黄土高原风貌图时，设备屏幕上便会叠加呈现出辽阔的、浑厚粗犷的

土高原三维动态景象，同时响起高亢苍凉的信天游原声。画面中的羊群、头扎白毛巾的牧羊人生动解释了信天游的曲调、节奏与这片土地的联系。二是增强课堂中的互动体验，以学习《茉莉花》为例，教师可分发印有特殊标记的卡片，学生用设备扫描卡片时屏幕上便会浮现出一个虚拟的江南水乡场景，通过触控屏幕选择不同的乐器为演唱伴奏，即时听到不同配置带来的韵味变化，或者设计一个“音乐寻宝”游戏：在教室的不同角落放置代表不同民族音乐文化的符号，学生分组扫描，解锁蒙古族的呼麦、藏族的囊玛、维吾尔族的十二木卡姆等片段，并完成简单的聆听与答题任务。从而在游戏化的探索中广泛接触多样的民族音乐风格。三是学生可将AR体验与手工课结合绘制心目中的民族音乐场景，制作成一个民族音乐明信片。这个过程不仅巩固了课堂所学，还能将学生从被动的消费者转变为主动的创造者和传播者。

共创，跨学科音乐剧项目激活民间音乐元素。跨学科音乐剧项目是通过一个完整的创作与排演过程将民族民间音乐元素从单纯的听觉素材转化为驱动叙事、塑造人物、渲染情感的核心力量。学生在解决真实问题的过程中全方位地激活并内化民间音乐知识。具体可以以一个学期为周期，围绕一个核心主题展开，教师可以确定一个如“丝绸之路上的乐音”主题，学生们需要进行文献查阅和集体研讨，从历史典籍、地方志或民间故事中汲取灵感，构思一个能够融入多首代表性民歌或器乐曲的故事情节。剧本可以讲述一支商队的旅程，沿途经过西安、新疆、中亚等地，每一站的情节都自然地引入当地标志性的

民族音乐；语文老师指导学生进行剧本写作、台词打磨，历史老师则确保故事背景和文化细节的准确性。

音乐教师根据剧情需要进行适当的改编，学生们也可以参与简单的器乐编配，尝试用民族乐器与键盘、吉他进行融合；美术老师则指导学生进行舞台美术设计，与音乐风格、故事发生的民族地域特色相统一；舞蹈老师则负责根据民间音乐的节奏与情绪编排具有民族特色的舞蹈段落，让学生在学跳这些舞蹈动作时能更深刻地理解音乐与身体律动之间的关系。最后，是戏剧排练与综合展演。学生们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特长分工承担演员、乐手、舞美、灯光、音效等不同职责，在反复的排练中，学生们能切身感受到一首简单的民歌如何在完整的一部完整的戏剧中成为推动情节、抒发情感的关键。当项目最终以一场正式的演出呈现在全校师生和家长面前时，民族民间音乐真正落在了学生的主动探索与集体创造之中，成为了他们生命中一段深刻而美好的文化记忆。

民族民间音乐艺术不仅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青少年文化自信与民族认同感的有效载体，更是全面提升学生音乐素养、激发创造力与协作精神的宝贵资源。通过沉浸式AR技术、跨学科音乐剧等创新实践策略，能够让古老的民间音乐以鲜活、生动的方式融入中小学课堂，为他们的全面成长注入了深厚的民族底蕴与艺术滋养。未来，我们期待看到更多将现代科技与民族民间音乐深度融合的教学探索，推动民族民间音乐教育走向常态化，在美育育人中发挥更坚实而长远的作用。

（作者系浙江丹徒实验学校教师）

中国古代诗歌审美艺术中的民族文化印记

董小燕

中国古代诗歌以精妙意象和深沉情感，构筑了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景观，这些景观中镌刻着各民族交融的痕迹。诗歌创作过程就是民族融合的生动写照，从《诗经》到唐宋诗词，各民族的声音在汉字韵律中回荡，形成了共有的审美范式。这种印记源于历史变迁的合力，通过意象的共生、情感的共鸣与精神的升华，彰显了中华文化的内在张力。审视这些印记，有助于理解诗歌如何在审美艺术中凝聚民族认同，推动文化不断传承。

古典诗词的多元民族起源

边疆民族的诗篇融入。早期诗歌中，边疆民族的歌声直接注入汉文体系，丰富了诗歌的审美维度。《诗经·采芣·玄鸟》描绘天命玄鸟降生商族，记录了东北民族的鸟卵起源传说，这种飞鸟崇拜的意象成为诗歌中永恒的审美符号，赋予作品以神秘而生动的张力。《诗经·小雅·采芣》捕捉周人与西戎激烈战争离愁，“杨柳依依”与“雨雪霏霏”意象，源于周人游牧记忆，体现了中原与西北民族在农耕游牧间的徘徊，最终导向礼乐文明的审美升华。《诗经·秦风·蒹葭》记录春秋楚鄂传奇，通过“蒙羞被好兮不啻涸辙”的柔情意象，体现超越地域、跨越语言的审美共通性。《楚辞·九歌》沟通南蛮与中原的审美界限。唐代刘禹锡《竹枝词》借巴渝民歌曲调，吟唱“东边日出西边雨”的天气变幻，细腻刻画西南儿女生

活风情。从东北飞鸟传说到西南雨雾缠绵，诗歌意象体系不断扩展，体现了各民族生活场景在审美艺术中的统一。诗人血统的民族交融。唐代诗人队伍中，少数民族血统的渗透，进一步深化了诗歌审美的民族内涵。白居易出自龟兹王族，其诗作继承西域音乐节奏，赋予唐诗不同韵律美。元稹为鲜卑皇室后裔，情感抒发融入北方游牧豪放；刘禹锡的匈奴血统在《竹枝词》中显露，细腻描绘巴渝儿女柔情。这种血统交融，使诗歌创作超越民族，成为各民族共同的审美表达。元代萨都刺《上京即事五首》以“牛羊散漫落日下”的草原景象，展现回族诗人的故土眷恋。“野草生香乳酪甜”的描绘，将游牧温暖转化为审美符号，体现胡马依北风、胡儿思汉音的情感共鸣。与中原诗人的“裘马逐逐”形成对比，共同铸就民族精神的审美统一。金朝完颜亮《忆临安山水》以“提兵百万西湖上”的雄心，表达女真审美对江南的向往。这些作品以理性乐观精神，赋予长城精神力量的审美维度。清代乾嘉“一家内外”的描绘，更彰显民族亲如一家的历史图景。这些意象从朔方筑城到贺兰山绝，情感从控诉战争到祈盼和平，构建诗歌审美中的民族融合框架，体现仁爱、民本、和合大同的核心精神。

品格与气节的集体铸就。诗歌审美中的民族精神，还体现在品格与气节的集体塑造。这种塑造源于各民族的英雄叙事与情感共鸣。《诗经·蒹葭》“道阻且长，溯洄从之”，表达崇高理想追求，奠定孤高品格的审美基调。汉乐府《东门行》《孤儿行》记录普通人命途坎坷，提炼出仁爱民本的价值观念。爱国主义是诗歌铸就民族气节的永恒主题。屈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荆轲

“风萧萧兮易水寒”，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这些情感凝聚民族品格，塑造诗国人民的爱国高地。唐诗中，李白峨眉月山的怡情，王维大漠孤烟的雄浑、杜甫国破山河的忧世，王昌龄“不破楼兰终不还”的豪迈，高适“万里不惜死”的赤胆，均体现边国拓疆的审美气魄。宋词中岳飞“怒发冲冠”的激情、陆游“塞上长城空自许”的悲愤、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的豪情，共同铸就了民族流派的审美境界。这金元时期，耶律倍、完颜亮、元好问、耶律楚材等各民族诗人的作品斗妍，推动中华诗歌多样审美的发展，形成共生共享的文化格局。明清诗人如刘基、高启、袁宏道等，在继承中创新，体现刚健与柔美、阳刚与流俗的审美融合。诗歌哲理如刘禹锡“沉舟侧畔千帆过”，苏轼“月有阴晴圆缺”，于谦“要留清白在人间”，形成审美中的道德脊梁。这些品格与气节的集体铸就，不仅源于各民族的贡献，还在审美艺术中形成了人文精神的交织，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开阔胸襟与乐观豁达。

中国古代诗歌审美艺术中的民族文化印记，源于各民族的共同创造与精神融合，从诗篇的意象、情感构建，再到品格的气节升华，这些印记构成了中华审美的核心框架。古典诗词通过韵律的铿锵、意象的生动、情感的深沉与品格的崇高，凝聚了多元一体的民族认同，推动了文化传承的连续性。这种审美艺术不仅是历史的镜像，更是当代精神的源泉，它激励我们在新时代中深化民族团结，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文化的创新发展与全球对话。

（作者系盐城工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